

## 再识宁武大藏经

□ 范月珍 山西省图书馆

1975年10月,按照周总理“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指示精神,全国文化、文物、档案、教育、宗教等相关系统成立专门机构,积极开展古籍善本调查工作。山西宁武县也成立了“古籍善本书征集办公室”,负责本县的古籍调查,该县延庆寺内有一批大藏经,是这次调查的重点。延庆寺位于县城西北,寺院后部有宝藏楼一座,年久失修,大门紧锁,大藏经便封存在宝藏楼内。调查工作开始后,县文化局便组织人员对楼内尘封多年的藏经进行了整理上报。之后,又将大藏经从延庆寺内搬运出来,存放在宁武县文化馆的几间平房内。

### 一、宁武大藏经版本的不同意见

关于宁武县发现大藏经一事,先后被《中国文化报》《羊城晚报》《山西政协报》等媒体报道,引起相关专家学者的关注。

198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童玮研究员一行考察和鉴定了这部大藏,认为是一部未见记录的大藏经,刊刻于明万历十七年(1657)至清顺治十四年(1589)间,并命名为《万历藏》。由于大藏经史上并没有一部官刻《万历藏》,所以他认为这是一部私刻版大藏经,同时,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和1997年出版《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中增加了《万历藏》词条。

200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何梅研究员也赴宁武实地考察。她认为,这是一部《永乐南藏》的续修本,并在《明〈永乐南藏〉研究》一文中对以上情况作了详细介绍<sup>①</sup>。

2008年冬,笔者与同事前往宁武县核实情况,最终将这部大藏定为《永乐南藏》及其《续藏》,并推荐申报国家珍贵古籍。2009年,在严格评审的基础上,经国务院批准,宁武大藏经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由于宁武大藏经最早被认定为一部从未见记录的私版大藏,即使被重新认定为《永乐南藏》并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后,称其为《万历藏》者仍然不少,至今,仍然不止一种

<sup>①</sup> 何梅:《明〈永乐南藏〉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2003年,第52—73页。

学术杂志收录的论文是关于《万历藏》研究的。所以，对这部大藏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仍然十分必要。

明代，官方先后刊刻了三部大藏经。第一部是建文末年南京蒋山寺刻成的大藏，后人称《洪武南藏》或《初刻南藏》。永乐五年（1407）时，《洪武南藏》的经板与寺庙一同毁于大火，印本极少。第二部是明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八年南京大报恩寺刻的大藏，后人称《永乐南藏》（图1）或《再刻南藏》，全藏共635函6320卷，千字文自“天”字函的《大般若经》至“碣”字函的《佛祖统纪》，经板保存在报恩寺，可供各地寺庙请印。第三部是明永乐十七年至正统五年（1440）司礼监刻于北京的《永乐北藏》，也称北藏，北藏经板存于祝崇寺汉经厂，若不是朝廷诏赐，即使是著名的丛林，想要请印也无力为之。所以，三部大藏中，《永乐南藏》刷印最易、流传最广、版本也最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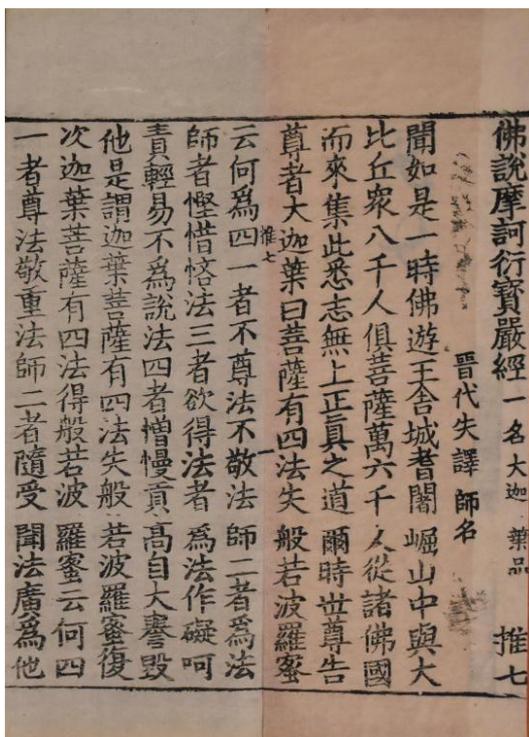


图1 明《永乐南藏》书影

## 二、《永乐南藏》续藏的刊刻情况

《永乐南藏》刻成后，在明清两代，至少有三次续藏活动，后人将永乐十八年前刻成的部分称为正藏，之后续刻的称为续藏。最终，正藏和续藏合为678函，千字文函号至“鱼”字止。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前，大藏第一次续藏（图2、3），续入经文4部25卷，增加“石”“巨”“野”3个函号，同时，在“大”字函中增入《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1卷。这次续藏，未见史料记载，但有文献实证，太原崇善寺收藏的《永乐南藏》已经续入了上述内容。在这部大藏的《大般若经》卷十尾部施经牌中有一则请经题记，载曰：“大明国山西晋府承奉正袁定特伸微恳，谨露丹衷，喜舍珍资，印造经律论一大藏，

共计六百三十八函……施于文殊寺，永为奉供。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吉旦。”说明这部大藏是明嘉靖二十九年由晋府请印、供奉于文殊寺的，首次续藏时间不晚于嘉靖二十九年。另外，续入的“石”“巨”“野”3函的经文和“大”字函的《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虽然字体风格相同，但版式和笔画粗细不同，应当是同一时期分次续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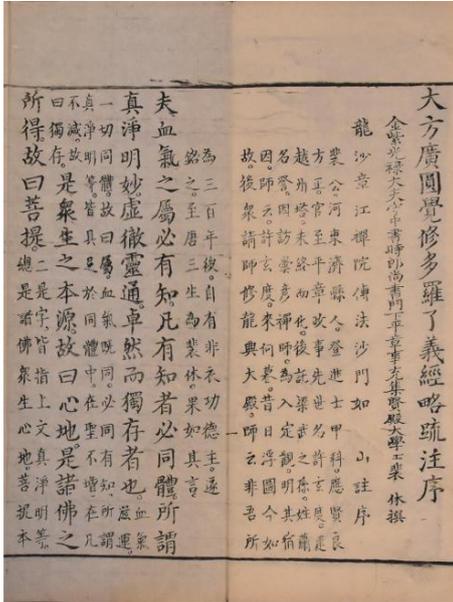


图2 明中期第一次续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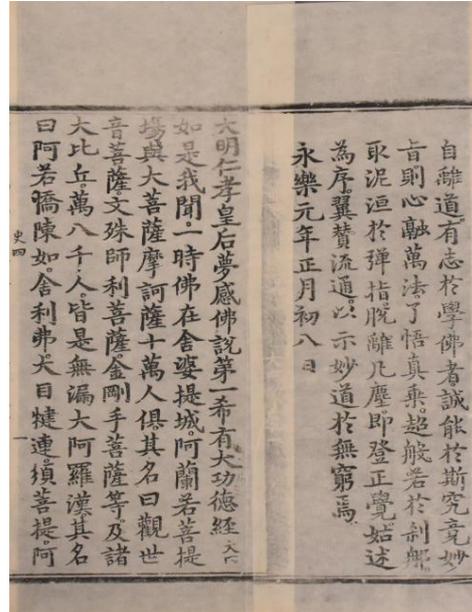


图3 明中期第一次续藏之二

第二次续藏（图4）在明万历年间。万历初年，慈圣宣文皇太后命工刊佛教典籍41函，续入《永乐北藏》，之后又命续入《永乐南藏》。此事记载于万历三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刻成的《报恩寺九号藏经并藏殿碑记》，碑文记载：“其歎于北者四十一函，即以请藏所入，贍续藏所出，需之数年，计可具足，则皆予壬寅（笔者注：万历三十年）摄篆时规始者也。今兹复至，杀青竟且十有四函矣。”由此可知，《永乐南藏》的第二次续藏始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正月时刻成14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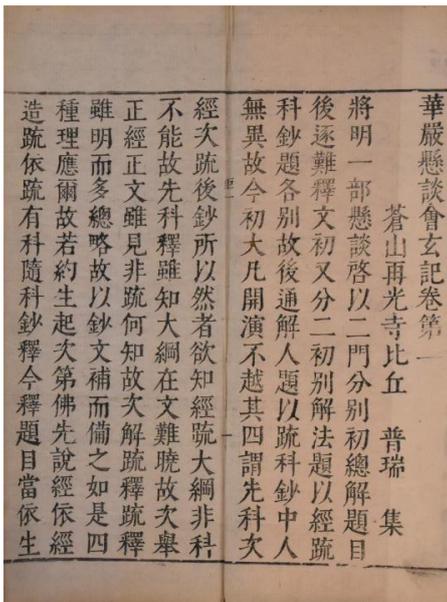


图4 明万历第二次续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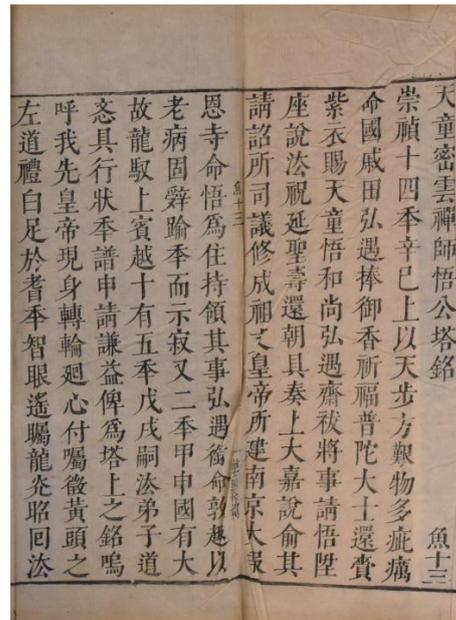


图5 清顺治十八年第三次续藏

第三次续藏（图5）在清顺治十八年。时僧录司遵依御旨，再续入藏经一种。这次续藏的实证文献正是宁武大藏经，在这部大藏的“鱼”字函新增了《密云圆悟禅师住龙池禹门禅院语录》一种13卷，卷一有题记，载曰：“金陵东山翼善禅寺为钦奉上传事，承钦依僧录司咨移江宁府僧纲司，遵依御旨，批降《密云圆悟禅师语录》十二卷《年谱》一卷，即行发刻入藏，以永其传。等因钦此。钦遵随经僧纲司移会到寺，该住持嗣法孙臣僧本咸谨刊，为经板计十三卷，入于报恩大藏，用广流通……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日，住持嗣法孙臣僧本咸谨识。”这次续藏后，未再见到《永乐南藏》续入新内容。

《永乐南藏》从正藏刻成到三次续藏结束，历时241年，不同时期刷印的大藏在帙号、卷数和板刻字体上多有不同，这些不同之处，正是辨别《永乐南藏》不同时期印本的重要依据。

### 三、《永乐南藏》的经板补修

继宁武大藏经被误判为《万历藏》以后，2017年，陕西省榆林市的星元图书馆又发现了一部大藏经，也被相关专家认定是一部新的大藏，命名为《榆阳藏》。后来，这部《榆阳藏》同样被证实是《永乐南藏》。

那么，为什么《永乐南藏》屡屡被误判为新的大藏经呢？这与《永乐南藏》三次续藏和持续不断的补板活动有关。

《永乐南藏》的刻印事务由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掌管，民间各大寺院经申请批准，即可请印供奉。万历三十四年以后，祠祭清吏司制作了《南藏目录》，并在目录之后附印《请经条例》，规范了印经秩序。按《请经条例》规定，全藏每年准印20部，同时再准印大般若、宝积、华严、涅槃4部小藏20部；一部全藏需要用纸110526张，其中包括全页纸107782张和卷尾所用半页纸2744张；凡请印者，有三种纸、三种装帧、九种规格与价格可供请印者选择。所以，《永乐南藏》的不同印本，根据请印者的财力状况，纸张、函套、装帧等载体形态可能完全不同，不能将这些因素作为判别版本的依据。

《永乐南藏》的经板收藏在南京报恩寺，咸丰六年（1856），报恩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经板也一并被毁。从永乐十八年正藏刻成，到咸丰六年经板被毁，有436年之久，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和刷印活动的磨损，最初刊刻的书板在不断腐朽损坏，需要通过不断补刻新板，换掉损坏的旧板，才能印出一部完整的大藏。

根据康熙年间的史料记载，《永乐南藏》大规模补板活动有三次：分别是明正统（图6）、万历（图7）和明末清初。清康熙五年（1666）刻立的《重修修藏社藏经殿碑记》记载了这三次补板活动：“报恩寺为金陵上刹，旧有藏经殿，刊刻经板，咸贮其中。自明永乐庚子肇始，后，正统、万历，代有增修，其所为六百三十七函及四十一函者，至今犹厘然具备。岁久浸蚀，几于漫灭。觉浪和尚嘱松影等，补其残缺，易其湮漫，工费浩繁，乃别立修藏一社，经营其事。虞山钱宗伯、涉江陈待御，交相赞助，事有成立。”从中可知，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钱谦益等人是明末清初修藏活动的组织和参与者，在钱谦益的诗文著述《有学集》中，也收录了专为这次修藏活动撰写的“大报恩寺修补南藏法宝募缘疏”一文。康熙六年《江宁府志》也记载了修藏一事：报恩寺“禅堂前有修藏社，藏南藏板，僧松影修藏，十年藏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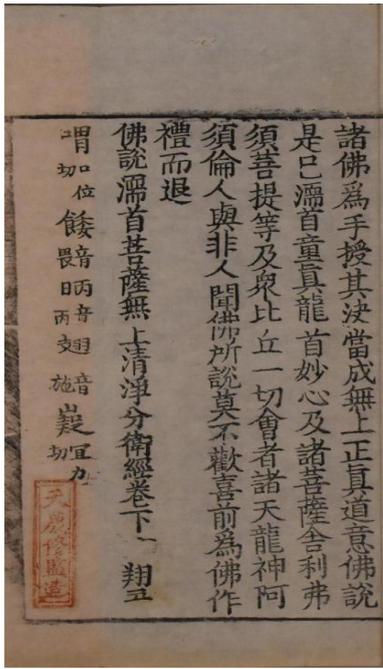


图 6 明前期补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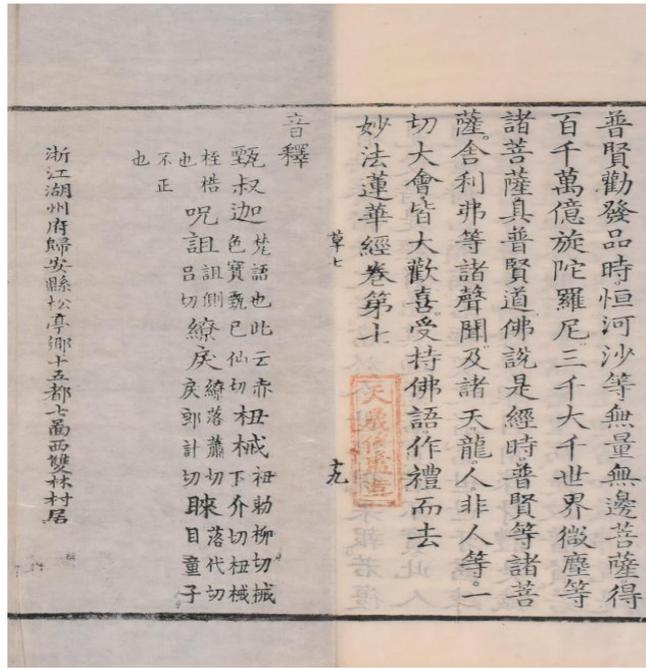


图 7 明万历补板

虽然南藏是一部官刻大藏，入藏内容要遵御旨，但是，具体补板事宜由报恩寺组织，雕刻费有官方拨付的板头银，也有民间募捐部分。凡募捐所刻的板，就有施经题记和发愿文，施经者以江浙、湖广地区为主，其中不少是清代知名学者和官员，比如：钱谦益、蔡世英父子、织造工部侍郎周天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袁廓宇等，这些官员往往也是补板组织者和捐资最多者。在宁武县大藏经“贞”字函《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卷端有“礼部尚书钱谦益助刊”（图8），“惟”字函《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卷末有“钦命总督漕抚部院信官蔡世英，长男毓荣、次男毓华、季男豫章，捐资助刻大藏尊经板壹千块，仰报门恩……顺治乙未菊月吉旦”（图9）等刊经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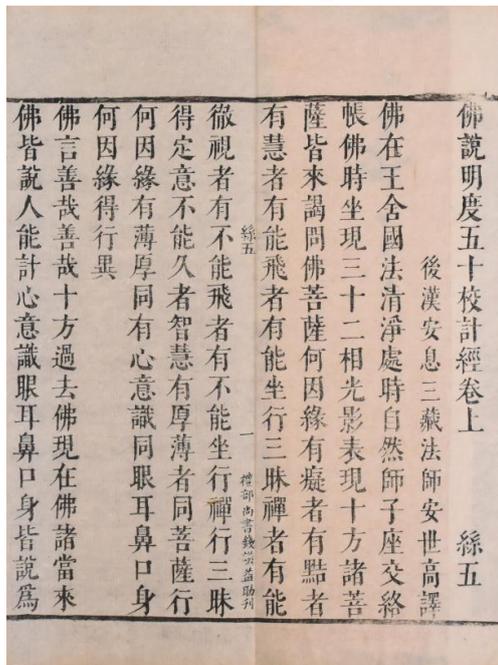


图 8 清初钱谦益助刊补板



图 9 清顺治年间蔡士英父子助刊补板

从宁武大藏经来看，除了史料有记载的三次补板，应该还有一次大规模补板活动，这次补板贯穿大藏经首尾，使用的是方宋字，与顺治十八年最后一次续藏和顺治年间的补板所使用的长宋字完全不同。补板中有刻工姓名，主要刻工是黄学诚。由于黄学诚暂无考，无法推断补板时间，但是，在“服”字函《法镜经序》有“乙巳年学诚刻”一行刊记，可以将“乙巳年”可以作为黄学诚补板的时间依据。由于黄学诚补板使用的是清前期产生并流行的方宋字，补板上限可以定在入清之时。另外，大藏经中有一些不同时期的墨笔题记，这些题记必然是在大藏经印刷后所书，可以将题记的时间作为补板时间的下限，经查，书中最早有明确年代的一款题记是乾隆二十年（1755），结合前述，自清代立国至乾隆二十年间，只有康熙四年和雍正三年两个乙巳年，故黄学诚补板（图10）的时间应当在此间前后。

雍正年间，《径山藏》刻成，清乾隆三年，《龙藏》又刻成，各地寺庙请印大藏经逐渐开始使用新刻的大藏经板，请印《永乐南藏》者便寥寥无几，也不会再对《永乐南藏》进行补板。所以，这次补板也是最后一次补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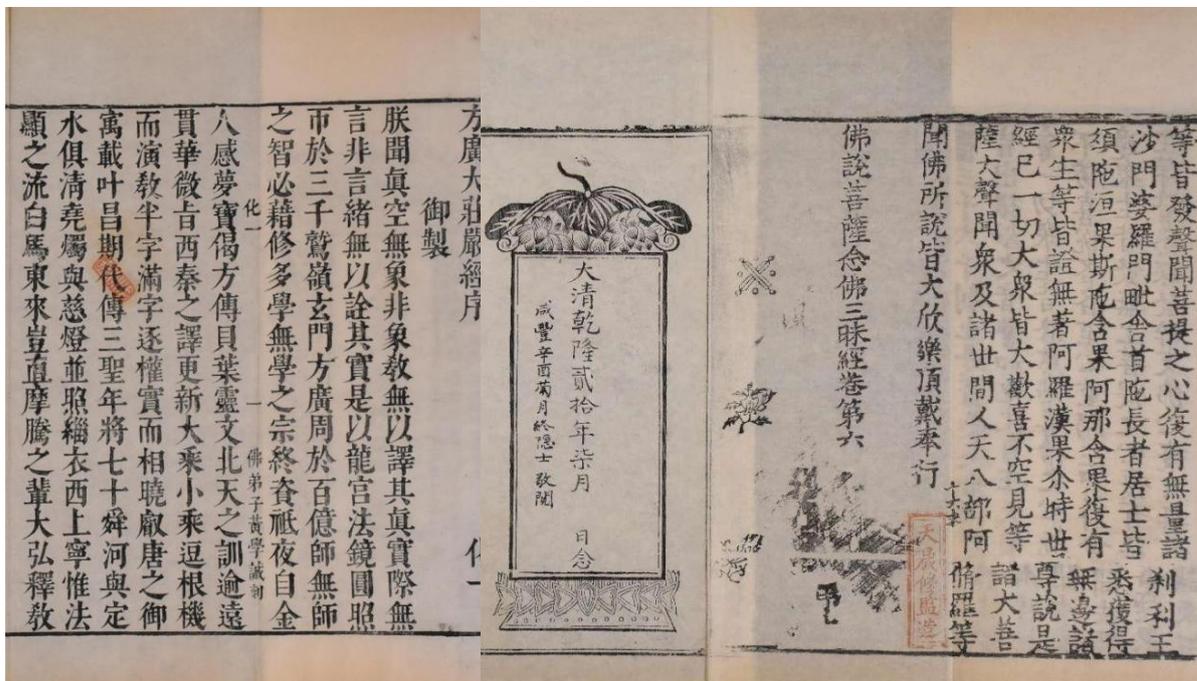


图10 清康熙雍正间补板

图11 乾隆二十年题记

到了清代，经过多次续藏和补板，《永乐南藏》经板中的初刻板越来越少，这时刷印的大藏经，整体面貌与初刻成时已经有很大区别。忽略这个因素，将后印的南藏与初印时的南藏相比，很容易将补板部分作为原刻而误判版本。宁武大藏经和榆林大藏经都是后印本，版本误判的原因都是忽略了补板这一重要因素。

#### 四、宁武大藏经刷印时间考证

根据万历年间《永乐南藏》的《请经条例》规定，一部全藏的印刷周期是三个月，如果允许一年刷印20部全藏和20部四小藏，一家经铺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在报恩寺周围便聚集了多家经铺，共同从事补刻和印造大藏经之事。

一般来说，凡请印大藏经，多有请经题记，题记会记录请印人、供奉寺庙和印经时间等，请印者不同，题记就不同。但是，宁武县大藏经并没有请经题记，这部经的具体请印时间便不得而知。不过，书中有一些读经批注，可以作为印经时间参考。在宁武大藏经“翔”字函第七册、“深”字函十三册、“吊”第七册、“伐”字函第九册、“臣”字函第十册、“驹”字函第十册、“及”字函第十册等多部经的卷末施经牌内，都有未署姓名隐士的墨笔读经记，时间在咸丰同治年间，诸如“大清咸丰辛酉孟冬初旬隐士 敬读”“大清同治元岁次壬戌桃月望日隐士 敬阅”等。另外，在“吊”字函《佛说菩萨念佛三昧经》卷六尾部施经牌记中有佚名墨笔书“乾隆貳拾年柒月日念”（图 11）一行，“改”字函的第十一册《佛说一向出生菩萨经》一卷书衣内有“乾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六月初十日午后阅 主人水头陀记”墨笔题记，这两处题记是在宁武大藏经中发现的最早题记，结合前述中雍正三年前最后一次补板的推断，宁武大藏经应当刷印于雍正三年之后、乾隆二十年之前的这段时间内。

## 五、宁武大藏经的来历

宁武大藏经没有请经题记或请经墨戳，但是，在“临”字函的《佛说胜瓔珞陀罗尼经》卷末施经牌内有佚名墨笔题记：“信 捐资印请藏经 卷，恭奉广西全州金山寺供养流通，作今生善因，种来世福界。”说明此藏供养于广西全州金山寺。

同时，部分经册卷端钤盖有“广西全州金山常住”竖长双边阳文朱印（图 12），每册经的末页钤盖“天晟修监造”同款朱印，说明该大藏归属于广西全州金山寺，由天晟修监造。两枚印章的印文款式和字体相同，印色一致，出自同一篆刻者之手，同一时间钤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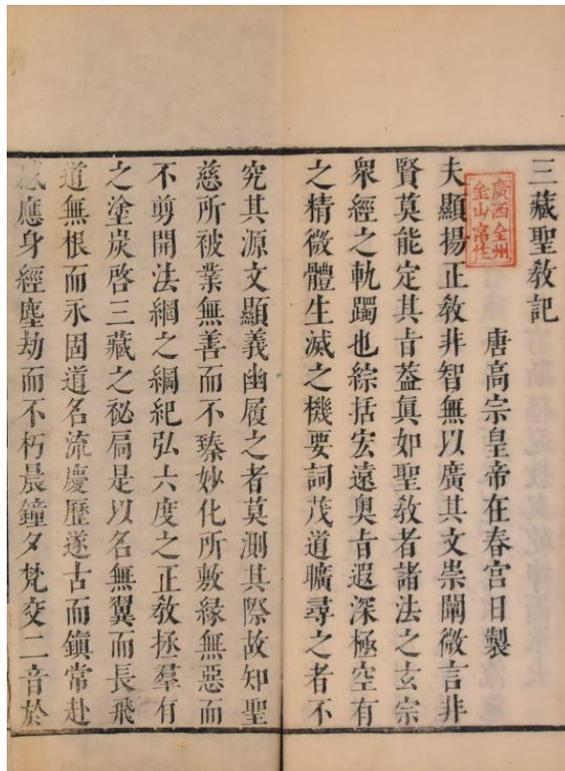


图 12 广西全州金山寺藏经印

宁武和全州相距约 1800 公里，大藏经是什么时间和什么原因从全州迁移至宁武的，在乾隆和咸丰两次修的《宁武府志》中均未找到记载。从这部大藏来看，最后一次续入的《天童密云禅师语录》是明末清初高僧圆悟的著述，圆悟是临济宗高僧，金山寺嗣祖沙门第三十世和尚，曾任大报恩寺主持；为圆悟著述捐资雕板者也是临济宗弟子，在《密云圆悟禅师语录》卷十二末有“弟子玄慧等领刊语录年谱全部”的刊记题记。而宁武县延庆寺和全州金山寺都是临济宗的寺庙，虽然两座寺庙相距千里之遥，却同门同宗，又逢临济宗高僧圆觉语录最新续入大藏经，这或许正是大藏经能入藏金山寺并千里迢迢运至延庆寺的主要原因。

关于大藏经迁来宁武的时间，清乾隆二十九年刻立的《延庆寺藏经阁碑记》有一段文字可作依据：“宁武僻处边塞，藏书家绝少，借书之痴，每于邻僧得之。郡署东隅之延庆寺僧希寒，精戒彻，喜蓄内典，建阁五楹，贮经全藏且检其缺漏，补经三十五函，水陆八十五轴，可谓能稽古者矣”。依照碑文所记，在乾隆二十九年时，希寒和尚便新建藏经阁一座，以贮“全藏”，这里所说的“全藏”是指整部大藏经而非单经或大藏经散出的零星经，同时，希寒还补齐了大藏缺失。检宁武大藏，“罔”字函有十二种十二卷皆为旧时抄配，印证了大藏经抄配一事。以此推断，大藏经迁移宁武的时间当在乾隆二十九年前不久。

虽然宁武大藏经并不是一部所谓的私刻《万历藏》，刷印时间也比较晚，但却是距《永乐南藏》毁板时间较近的一部大藏，反映了《永乐南藏》在清代前期的整体面貌，完整保留了明清两代多次续藏和补板遗迹，为《永乐南藏》和大藏经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